

我對人間佛教歷史定位的理解



李利安

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

兼任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國統戰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員等。研究範圍包括：中國佛教歷史與思想、宗教學理論與宗教現實問題等。主要作品有：《金剛經般若思想初探》、《古代印度觀音信仰研究》、《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慈悲喜捨：佛教菩薩觀》等。



如何認識人間佛教，目前在學界和教界乃至其他社會領域還都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人間佛教是一個派別，一個宗派，還是諸多佛教思潮之一，甚至人間佛教是不是佛教，以及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的區別和聯繫等等問題的存在，都說明人間佛教的內涵定性和歷史定位，依然是一個尚未獲得明確而一致看法的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

關於人間佛教的內涵，學界過去已經有很多討論，本人在相關論述中也有涉及，總體上看，大家一直認為人間佛教是與現代社會接軌的一種文化，所以在思想與實踐、組織與制度、乃至精神氣象與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呈現出強烈的現代氣息。當然，如何評論這些變化，學者們並未獲得共識。關於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學術界專門研究的不多，儘管只是在相關論述中有所涉及，但大部分學者一致認定，人間佛教在近現代中國佛教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近現代以來中國佛教的轉型不是空穴來風，不但有明清佛教進入近代社會之後歷史發展潮流的推動，也有佛陀創教之時所建構的文化基因的激發，特別是到了今天，還有全球化時代三大語系佛教逐漸會通所帶來的共用平台建構，以及深刻觀察地球村格局下人類文化未來走向的文化自覺。所以，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應該從更加廣闊的視野中去觀察。

前段時間，筆者通過視頻連線為佛光山叢林學院的學員們彙報了我對人間佛教歷史定位的一些想法，今天就把那次

講座的内容再在這裡彙報一下。從思路框架來看，主要是從佛陀創教之人間性基因、佛教人間性在中國之起伏、當代世界佛教共用基礎之形成、未來人類文化之共建等四個方面進行理解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分別形成四個觀察維度：印度佛教創立史、中國佛教發展史、三系佛教會通史、未來文化建構史。四種歷史角度的觀察形成四種定位的圓融一體。

一、從印度佛教創立史的角度來看——在神性彌漫中亮出人性的曙光

釋迦牟尼時代是被雅斯貝爾斯稱之為「軸心」的時代。那個時期的印度、中國和希臘都處在文化極其繁榮的時代。總體上看，軸心時代不同地域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單一性。相對來看，中國重人與人的關係，人性色彩濃厚；希臘重人與自然的關係，理性色彩濃厚；印度重人與神關係，神性色彩濃厚。釋迦牟尼時代印度的主流文化是一種神性彌漫的文化。雅利安人從中亞進入次大陸後，先在南亞西北地方定居，他們崇拜的大多是自然神。西元前五世紀，他們的神已經遍布天、空、地三界，《吠陀》的權威已經確定，而《吠陀》中的神靈也開始出現了主神信仰，逐漸發展成「三神一體」的神靈體系，其中梵天被認為創造了一切，毗濕奴則維持和保佑一切，濕婆負責毀滅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婆羅門教堅持三大原則，即所謂《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婆羅

門至上。《吠陀》來自神的啟示，不可撼動；搭建人神關係的祭祀能夠解決一切問題；負責解釋《吠陀》並搭建人神關係的婆羅門地位最高。

這種主流文化建構了一個極其龐大的神團體系，在這個體系之內，神靈眾多、關係錯綜，用神來解釋一切、支撐一切、控制一切。在神靈的高壓下，人群被劃分為等級不同的種姓。在神靈的主宰下，祭祀成為首先重要的事業，神界所在的彼岸成為人們的主要嚮往，人們在神的靈光中快樂，也在神的靈光中痛苦，借神而生，向神而死，人性被嚴重抑制，人間的生活被神性嚴重遮蔽。

就是在這個時候的這種文化氛圍中，釋迦牟尼誕生了。在人性被神性嚴重壓制的時代，任何掙脫神性控制的想法都閃爍著人性的光輝，也都需要理性的智慧和勇敢的面對。悉達多太子出四城門遇見四種景象的故事說明，悉達多對人的觀察，已經擺脫了神性的籠罩，回歸到人的現實生命和現實生活，沉陷於神性或高架於神界的人顯露出人本來的面目，人的真實問題明明白白地暴露在哲人的眼前。悉達多所悟的四諦學說，就是對人的現實生命的解釋體系和生活問題的解決方案，其中包括生命存在的問題、生命問題的原因、生命快樂的境界、生命離苦得樂的方法等四個方面。

釋迦牟尼佛提出的一些核心命題，一改婆羅門教的神性瀰漫之風，呈現出面對現實的理性精神，如：人的生命是存

在問題的、是有提升空間的（苦）；人的生命是沒有永恆主宰的、是空幻而可以超越的（空）；世間一切都不是永恆的或停止的，而是不斷變化的（無常）；止惡行善、自淨其意是獲得人生問題最終解決的基本方法（修行）。這些核心命題，都是來自對人間的真切觀察，都是理性可以把握的思想和方法，都充滿了人間的情懷。星雲大師在《佛法真義》中對釋迦牟尼佛的核心教義作了溯本探源的解讀，揭示了原始佛教教義與實踐中的理性精神，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從正統性這個角度來看，正是回歸佛陀的這種本懷。

所以，從印度佛教創立史的角度看，人間佛教不僅僅就是佛教，而且是源於佛陀並傳承至今的佛教正脈。

二、從中國佛教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人間性從被掩藏中重新復甦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壯舉。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一種文化遠距離輸入另一種文化區域之中，無論從輸入的時間，還是輸入的規模，特別是輸入的成功等方面來看，佛教從印度到中國都是史無前例的。佛教向中國輸入長達一千年，從兩漢之際到兩宋之際，佛教的輸入改組了中華文化的結構，重塑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佛教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的原因，根本上來說，並不在於人民的苦難或統治者的支持，而在於佛教文化彌補了中國文化的不足。

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一書中，對唐以前中國佛教的人間性格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說明，總體上可以看出，立足現實的生命拯救始終是中國佛教的思想主線；而從心性深處挖掘問題的根源，並尋找問題的突破途徑，始終是中國佛教的主流，而這種理論與實踐的人間性品格其實是非常強烈的。

從魏晉時代的佛教主流般若學，到隋唐時代的佛學主流八大宗派，尤其是中唐以後一枝獨秀的禪宗，都表明這種人間性格的主體地位。

宋代以後，隨著專制體制的強化及其對人性束縛及對佛教授控制的空前加強，佛教在退卻中日益顯示出逃離的情緒，為社會中被專制與禮教壓抑的人群提供精神避難的場所，同時隨著精神陶冶價值與現實面對精神的不斷喪失，佛教也開始不斷彰顯其對治死亡的功能，在文化地位日益削弱與現實救度功能不斷收縮的背景下，人間性也在不斷消滅。我們從以下六個方面來看：

第一，從教義方面來看，在解行方面，義理殘缺，談玄說妙，沉醉玄理，忽視生活實踐；與此同時，繁複艱澀，冗雜難明，缺乏通俗，讓讀者望而卻步；而在意趣方面，突出苦難、苦空無常、惡道畏懼、消極陰冷；在法門選擇方面，往往是以偏概全、偏執一法，特別是在保佑、往生、開悟等三種法門當中沉陷偏執。

第二，從儀軌制度方面來看，局限世外桃源，不便接引信眾；戒律森嚴高冷，脫離實際生活；清規多有呆滯，缺乏靈活機動；法事儀軌繁冗，形式掩蓋內容。

第三，從信仰心理方面來看，鬼神信仰普遍，畏懼於地獄報應之說，沉陷悲苦消極情緒，出離之心濃厚；同時熱衷神力崇拜，盛行神祕經驗；還有很多好禪之人俗化開悟體驗，盲目追求覺悟。

第四，從四眾弟子方面來看，僧主俗從的格局難以撼動，僧信之間存在隔閡；師徒關係森嚴，封建家長制盛行；寺院歸僧，居士無緣參與管理；四眾弟子零散分立，缺乏團體性紐帶；派系門戶之見普遍存在，相互之間隔閡很大。

第五，從寺院方面來看，位置上喜好山林，自我清淨，封閉保守，脫離社會；規制上形制一統，格局呆板；功能上主要是佛菩薩供奉地、僧尼修行地和信眾禮拜地，難以從事其他體驗、交流、學習活動。

第六，從佛事活動方面來看，以念佛念經、早晚功課、經懺佛事等為日常主業，注重外在形式，偏離聞思修等修行軌道。特別是懺法普遍盛行，以超度維持生計，度死為先，度生為輔；同時，密法盛行，既有神力期待，也有放縱欲望；而民眾信仰則以香火禮拜和念佛往生為主，功利化祈求和專注死後的宗教活動盛行，缺乏終極超越的訴求和心靈淨化與道德提升的實踐。

明清傳承下來的這些佛教積弊，嚴重制約著中國特色佛教文化的發展，只有勇敢超越，實現轉型，才有力量迎接時代的挑戰。

歷史發展到民國時期，隨著中外關係的變化，生產與生活方式的革命，社會體制開始全面轉型，在文化領域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在這種背景下，太虛大師順應歷史潮流，提出人間佛教的改革。此後，在大陸有趙樸初居士對人間佛教的提倡；在台灣有星雲大師的不懈努力，終於完成了對人間佛教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的完整建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教義來看，在繼承佛陀本懷前提下，面對佛教傳統脫離民眾、脫離主流文化、脫離現實生活、脫離正能量的怪像，呈現理性化、通俗化、生活化、陽光化的趨向。

第二，從教規來看，星雲大師的修道軌則也具有強烈的個性。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大師更加強調新的修行方法與新的教規，這些新方法與新教規告別了古板而神祕的定制，程式的繁冗與禮儀的嚴格，轉變為修行的清朗與方法的便捷；懲戒的森嚴與恐怖也轉向了積極宣導的輕鬆與快樂。

第三，從體驗來看，星雲大師指導下的信眾修行體驗與心理氣質也別有滋味，且自成情趣，風範感人。

第四，從組織來看，星雲大師領導下的佛光山這一團體，實現了僧俗與男女的平等，四眾弟子通過各種方式凝聚

一起，共襄盛舉。佛光的組織立足台灣，輻射全球，以既有機統一、又多姿多彩的形式，架構起遍布全球的組織體系。

第五，從道場來看，星雲大師主導下的道場建設既突破了佛菩薩供奉地的局限，也超越了傳統寺院的範圍，既具有人性化的特徵，也具有開放性的氣魄。

第六，從活動來看，星雲大師主持和宣導的佛教活動具有豐富多彩的形式和極其廣泛的內容，涉及與佛教相關的各個領域，極大地推動了佛教向社會各個領域的傳播。

綜上所述，從中國佛教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明顯呈現出三大歷史階段：從兩漢到隋唐，引進、消化、吸收印度佛教，佛教的精神性很強，並在學術、理論方面有明顯的體現；從兩宋到明清，佛教在中國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滲透中國社會，然消極避世的情緒日益強烈，佛教開始轉向封閉保守；從民國初年開始，為了對治佛教脫離社會、消極避世、退隱山林、神性瀰漫的狀態，佛教又開始了新的轉型，形成人間佛教的潮流。

所以，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歷史演進的結果，是中國佛教發展到第三期時的使命所在。人間佛教將使佛教最終回歸自己的本懷，將是第一個千年的「本土化」以及第二個千年的「民眾化」的綜合與提升，並使本土化和民眾化的最終價值落到實處。

三、從世界佛教會通史的角度來看——三大語系佛教因人間化轉型而走向會通

隨著資訊化時代的到來，全球化進程迅猛展開，西方文化向世界各地的傳播也更加普及與深刻，其他文化所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有識之士不斷呼籲人類文化應該保持多元互鑑態勢，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也在迅速復興，宗教文化之間的競爭也空前激烈。

資訊化和全球一體化過程為佛教三大語系之間的交往互鑒搭建了共用的平台，而宗教文化的激烈競爭也為三大語系佛教的團結協作提供了迫切的需求，於是從二戰以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三大語系佛教之間的會通出現前所未有的發展態勢。在歷史上，三大語系佛教一直沒有能夠實現世界範圍內的圓融會通：在中國漢地，自從元代之後，藏傳佛教向內地傳播，漢藏佛教之間交往密切，在很多地方實現了高度的會通，但總體上看，漢藏兩系佛教各自獨立發展，彼此之間的分野還是非常明顯的；至於南傳佛教與漢傳佛教、藏傳佛教之間交往就更加稀少。

歷史上南傳佛教和漢傳佛教之間儘管有往來，但更多的時候僅僅是表面的文化交往，而非信仰深層的彼此會通。但是近代以來，隨著全球聯繫的密集，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漢傳佛教和南傳佛教之間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密集交往，彼此會通的歷史才真正開始。

但是，三大語系佛教之間區別還是很明顯的，經典語言不同，教義與信仰不同，修行方式不同，導致相互之間存在隔閡。在科學理性、民主法治、自由平等這些現代文化的激發下，三大語系佛教都開始了現代化轉型，而現代化轉型的共同基礎就是人間化發展方向。所以，從中國開始的人間佛教，與南傳佛教中興起的入世佛教可以相互激盪、彼此借鑑，因為他們之間的共用基礎就是人間性。人間性可以成為三大語系佛教走向會通的紐帶，而三大語系佛教的會通，將迎來人間佛教的一個全新發展時代。

四、從人類文明未來史的角度來看——人類文明的發展需要人間佛教的融入

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一直占據著世界文化的中央，並在不斷向世界各地傳播過程中，和各種其他文化發生激烈的衝突。西方文化的確起到了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重大意義，但隨著今天世界範圍內各種問題的不斷滋生，西方文化的弊端也日益明顯：二元對立、缺乏柔性、科技主導、節奏快捷、欲望激發，這些都會給人類帶來高強度的擠壓，西方後現代思潮的興起其實就是對現代性的一種反思和批判。

而後現代其實借鑑了東方文化的智慧，特別是佛教文化，可以同後現代文化相互激盪，為西方文化提供補充，為人類未來文化發展指向更加寬闊多元的路徑。特別是人間佛

教當中的性空、淨心、超脫、因果、中道、平等、和合、圓融、慈悲等理念，不但是古代的精神財富，也是今天乃至未來的，不但是佛教的，也可以是整個人類的。正像星雲大師所說的，人間佛教必定是人類未來的一道光明。

方立天先生在中國人民大學宗教高等研究院高峰論壇上的講演中，將中國佛學思想精華概括為：緣起、因果、求智、修善、平等、慈悲、中道、圓融，並自信地說：「自由、平等、博愛等源於西方基督宗教背景下的理念，自文藝復興以來影響了世界幾百年；而在今後數百年，中國佛學思想的精華，也必將在地球村中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星雲大師則說：「當今的社會，人人都歡喜有積極的人生，有幸福的人生，有希望的人生，有未來的人生，人間佛教還不值得我們大家一致來宣揚、發揮，回歸佛陀的本懷嗎？宣導人間佛教，這才是佛教未來的前途，這才是人間世界的一道光明。」^①

總結——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

總結以上所說的四個方面，可以給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有個總體的把握。這種把握同星雲大師對人間的設定的四大標準其實是吻合的，這便是：

①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文化，2016年，頁138。

- 1.佛說的：對接兩千五百年前的佛陀，回歸佛陀本懷。這屬於歷史的傳承。
- 2.人要的：對接現代人的生活，從明清佛教的逃避中回歸現實人間。這屬於現實的應對。
- 3.淨化的：在三大語系佛教的會通中，回歸淨化人心的佛教本位。這是三系的歸宿。
- 4.善美的：面向人類文明的未來，支撐和引領人類的善美生活。這是未來的啟航。



寡言者未必是愚癡，
利口者未必是聰明，
自尊者未必是傲慢，
承順者未必是忠誠。

——《佛光菜根譚》